

试论张静如的中共党史学“中介理论”^{*}

王中平

[摘要]张静如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党史学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积极推进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有机结合,提出了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中介理论”主张党史学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线,坚持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同时要不断汲取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方法。“中介理论”作为党史学的学科理论,不仅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在党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而且有助于推进党史学学术性的提升,并为党史学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

[关键词]张静如;“中介理论”;党史学理论;中共党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K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22)04-0104-09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张静如在党史学上提出“中介理论”,用以指导中共党史的研究工作,使党史在学科理论指导下发展成为一门学科,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党史学科中指导地位的落实。张静如晚年所著《暮年忆往》一书,比较系统地总结了自己在学术上的工作,有专门介绍“中介理论”的部分^①,可见“中介理论”在其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位置。本文试就张静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于“中介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主要观点及对党史学科建设的意义作简要的梳理。

一、唯物史观与“中介理论”的提出

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共党史研究的结合涉及诸多问题,但根本性的问题有二:一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二是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状况的切实把握。只有这两方面具有相当的基础,才能谈到马克思主义与党史研究的结合问题,才能进而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史研究的“中介理论”。张静如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有较为充分的把握。在他看来,当时的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很多,诸如仅仅把党史作为政治理论课而不确定其学科性质和学科任务、研究中不注重史实的考辨等等,但根本的问题是没有形成符合这个学科实际并指导学科研究的学科理论。故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静如一直在学科层面上思考党史学科中的重要问题,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党史学理论,这就是后来形成的“中介理论”。这里的“中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共党史学科研究、学科建设之间的媒介,“中介理论”是张静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立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理论。

^{*}本文为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在中国的建立研究”(21YJA7100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张静如:《暮年忆往》,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15~322页。

对于张静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提出的“中介理论”，需要进行历史的研究，从而梳理出“中介理论”的演化轨迹。1987年张静如发表《党史学科建设断想》文章，比较集中地提出“中介理论”的相关内容，尽管该文还没有使用“中介理论”这个概念。该文认为，党史学必须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其理由就在于，任何学科“都要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①，并就如何在党史学中建立这种研究理论提出了几点设想：一是“弄清楚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现状”；二是“要弄清楚党史的研究与中国传统治史理论和方法的关系”，藉以“建立党史文献学、目录学等辅助学科”；三是要“弄清楚党史的研究与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关系”^②。在笔者看来，张静如撰写的《党史学科建设断想》文章，尽管也提出了以社会史为基础研究党史的问题，但该文主要还是将社会史的研究视域，作为拓宽“党史研究的领域”的重要方法之一，而不是作为建构的党史研究理论中的主要部分，这说明张静如此时提出的“中介理论”还是处于初步的提出阶段，在理论体系的架构和内容的丰富上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此情形下，张静如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初期的10年间，致力于完善和发展党史学“中介理论”工作，一方面就是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加以深入的理解和解读，在结合当代中国社会状况中梳理出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另一方面，则是对党史学研究状况中所反映出的重大问题，在整体考察的基础上加以细化和分类，并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统一中与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建立联系，将自己提出的党史学理论的相关主张加以调整、充实和提炼，发表了《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1987年）、《李大钊与现代化意识》（1989年）、《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1991年）、《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1991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1993年）、《李大钊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贡献》（1994年）、《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现代化》（1995年）等文章，最后以1995年出版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专著，系统地表征“中介理论”体系及其相关主张。

张静如自提出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之后，一直思考着如何将这一理论完善起来。1995年出版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著作，是以专著的形式系统地表述“中介理论”的尝试。对于这部党史学理论著作，张静如以自我反省的态度来看待，认为“这本书力图说明应该怎样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力图建立起一种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贯彻到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中介理论”^③。那么，“中介理论”到底应该向着何种方向而完善呢？换言之，“中介理论”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算是已经到了“完善”的地步呢？对此，张静如提出了四个要求：其一，“中介理论”必须能够“成体系”，亦即能够系统地反映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其二，“中介理论”必须有“可操作性”，就是说将唯物史观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加以具体化、可操作化，并使人们能够将这种“中介理论”运用到研究之中；其三，“中介理论”必须具有“时代性”，也就是这种理论能够反映时代特色，有助于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紧密地契合时代特征，从而使党史研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结合起来，并直接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其四，“中介理论”必须具有“实际”性，这是要求“中介理论”能够与社会实际做到紧密的结合，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状况及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做到紧密结合，也就是要抓住党史研究中主要的、

① 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

② 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

③ 张静如：《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根本的、关键性的问题^①。其后，张静如在“中介理论”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在“完善”理论体系上下功夫。对于“中介理论”所应涵盖的内容，张静如也是不断地加以概括和提炼，藉以达到不断完善的地步。譬如，1996年3月，张静如应郭德宏邀请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对“中介理论”作了六条概括。从研究的角度看，这里关于“中介理论”的六条概括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的体系相比，有这样几点显著变化：一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条，与“社会现代化”合为一条，同时还将原属于“社会进化和变革”中的“以社会史为基础”的内容合并进去，形成了新的第一条；二是新设了“上层建筑的社会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这一条，成为“中介理论”体系中新的第二条；三是对于在《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未能具体阐发的“方法论”的内容，但在《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已经提出的“注意吸收中国传统治史的理论和方法，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中的有用部分”内容，在添加“历史辩证法”这个内容之后又加以新的整合，形成了“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吸取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这一条^②。应该说，张静如对于1996年所做《关于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报告中的六条概括是不太满意的，故而在1999年10月撰写“评文纪事”时，又提出对“中介理论”表述“调整”为五条：“一、以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二、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三、以群体社会作用为基础，以个人社会作用为契机；四、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五、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为辅佐。”^③“中介理论”从六条又变为五条，在语言上也更为概括、抽象，在内容上的最大变化则是删去了原来六条中的“上层建筑的社会作用及其相互关系”部分。至2005年7月，张静如撰写《关于中共历史研究的基本知识》时，对“中介理论”的这五条概括没有变化^④。

二、“中介理论”的主要观点

张静如提出的“中介理论”是一个指导思想明确、观点鲜明、内容丰富、方法多元的学术理论体系。以下，基于张静如留下的学术著作和相关论文，试就张静如的“中介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作简要的梳理：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张静如建构的“中介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中介理论”体系中一以贯之的线索。应该说，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这是中国的党史学界形成的优良传统。张静如在创建“中介理论”的过程中，批判地承继着党史学的学术传统和研究工作的基本理念，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指导作用，认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中国的党史研究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建构中共党史学理论也是这样。张静如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作为历史科学的中共党史，当然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方法。”^⑤值得重视的是，张静如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党史学的指导地位，是与马克思主义在党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与建构中共党史学理论密不可分的，实际上就是要求党史学理论的各个方面皆在马克思主义的统帅之下。1989年发表

① 张静如：《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② 张静如：《静如文存》下卷，第898~899页。

③ 张静如：《静如文存》下卷，第902~903页。

④ 张静如：《张静如文集》第4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8页。

⑤ 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的《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文章，是张静如建立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的“大纲”，也就是说具有框架、概要的性质，但也是后来《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专著雏形，在张静如创建“中介理论”体系的历程中有着基础性地位。该文共有八个部分，除第一个部分是总体上讲学科建设“理论和方法”的必要性问题，其他七个部分皆是阐明中共党史研究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方法为指导”的问题，即研究党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方法”，就要“坚持历史主义”，就要“正确贯彻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等等^①。这是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共党史学中指导地位的具体化。张静如正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着具体而又切实的认识，故而他在《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著作中，能够重点地就唯物史观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现代化”“社会进化和变革”“社会意识”“个人和群众”这五个方面，分别梳理其与“党史学”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

二，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必然要求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变革中的突出地位，这就需要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提升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这样，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表述为中共历史的核心内容，并进而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共历史活动主线的主张，这在学术研究的进路上也就顺理成章了。张静如很早就注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并且在思想认识上也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张静如在1988年撰写的《刘少奇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理论的特色》文章中，提出要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角度解读“革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认定，社会革命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深刻。……而这一切都以生产力的解放为基础，而又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所以，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②张静如在1989年发表的《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文章中，认为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必须考察生产力”，研究新中国以后的党史“更应该突出对生产力的研究”^③。1991年，张静如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文章中，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活动的历史梳理，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可以说有两步，“这第一步应该叫做解放生产力”“走完第一步，就进入第二步。第一步是解放生产力，那么，第二步就是发展生产力了”^④。张静如在1993年发表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中指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贯串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始终，一切其他活动都以此为中心并为其服务。这样，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表述在研究对象中，就不无道理。”^⑤这就提出了“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党史研究“主线”的论断。关于“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线”的主张，张静如在系统地提出“中介理论”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著作中，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学”一部分而重点论述的。概括地说，“既然唯物史观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作社会革命的总目标，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那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自然成为其核心内容。”^⑥需要说明的是，张静如提出中共党史研究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线，并认为这个“主线”同时要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相联系，并且这个“主线”还要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具体工作中体现出来，如在对于政党、集团、个人历史作用的考量上、在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评价上就要有所体现，亦即不仅要确立“主线”而且还有

① 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② 张静如：《静如文存》下卷，第549页。

③ 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④ 张静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⑤ 张静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⑥ 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第4页。

一个“围绕主线”下的“主线展开”的问题。对此，张静如在1996年3月所作的《关于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的学术报告中，就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党史研究“主线”问题加以进一步的发挥，提出在党史“研究对象的表述”、党史“主体部分和重点部分的研究”、党史中评价“标准”等方面，都要体现并表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①。这就是说，中共党史研究既然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线，那就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基本内容和指导意义，同时还要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其他部分如社会进化与社会变革的理论、社会现代化的理论等紧密结合起来，“使中共党史主体部分和重点部分的研究体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亦即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条主线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得到系统地贯彻和有效地落实，从而全面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三，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在张静如提出的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中，“以社会史为基础”主张乃是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个部分在其学术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张静如提出的“以社会史为基础”主张，是说党史中对于一些比较重大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是要充分地利用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使研究工作有着社会史的研究底蕴，另一方面是在研究的视域上，要基于社会内容的丰富性及多样性，立足于从社会生活的诸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不断提升中共党史研究的史学内涵和底蕴。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张静如提出的“以社会史为基础”学术主张，不仅是基于史学研究要求来深化党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而且也是构建中共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中的方法论。这一主张有这样几个重要观点：其一，“以社会史为基础”主张的目的在于深化党史研究，是利用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为中共党史研究服务，并使党史研究成果更好地体现出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总体背景。张静如指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是为深化党史研究，而不是叙述社会史本身，目的就一定要明确。”^②“以社会史为基础”主张在于使党史研究的范式发生转变，提升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内涵，不仅使党史研究建立在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而且也使党史研究者善于从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诸方面去解释党史问题。譬如，对于党史研究中的“革命”问题，是党史研究者不能绕过的问题，这就需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来加以分析，“都需要从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诸方面去解释”^③。这就是说，“以社会史为基础”的目的是利用并借鉴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为党史研究服务，而不是去专门搞社会史研究。其二，“以社会史为基础”主张需要以“问题”为牵引，关注党史研究中的“大问题”，并依据问题与社会生活诸领域关系的密切程度来加以分析。张静如指出，“以社会史为基础，不是说党史中的一切问题，都从社会生活诸领域进行分析”，关注的只是比较“大的问题”，至于“小的问题不必也往往不可能做这样的分析”。其三，“以社会史为基础”来研究党史，不仅要注意汲取社会史研究的成果，而且也要注意运用社会史中的相关材料，就是说要使用社会中的一些新材料，“特别是一些统计材料、社会调查材料”^④。其四，“以社会史为基础”来开展党史研究，一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保持党史研究有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张静如看来，无论是开辟新的学科或者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变成非马克思主义的俘虏。“以社会史为基础”而考察了社会生活诸领域的材料之后，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对相关的材料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分析，从而在材料的分析之中看到问题的实质。为此，张静如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主张，将坚持马克思

① 张静如：《静如文存》下卷，第900页。

② 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③ 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④ 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主义指导地位列为重要的一条,强调通过“以社会史为基础”的办法来“深化党史研究”,“当然也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①。以上,初步梳理张静如提出的“以社会史为基础”主张的几个重要观点。张静如正是有“以社会史为基础”这个主张,以后又相继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等领域耕耘,不仅形成了时段性质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等社会史专著,而且也形成了通史性质的《中国现代社会史》(上下卷)、《中国当代社会史》(5卷)等系列性的社会史著作,在社会史领域自立新例、自创体系、自成一家。

四,不断汲取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在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构党史学的“中介理论”,自然离不开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关系,因为党史在广义上说也是一门关于历史研究的学问。史学是中国的传统学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史学也只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的事。中国传统史学有着丰富的传统,在治史方法上亦有其独特之处,业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资源。张静如在1989年发表的《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文章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开放性,认为“中国传统治史理论和方法是充实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之一”^②。张静如不仅强调汲取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意义,而且也揭示了借鉴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对于提升党史研究学科地位的重要性,其目的自然是推进党史学理论的建构并使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同时也在使党史学有如历史学那样的严谨性和学术性,因而在学术理念上和治学方向上也有使党史学向着史学化方向发展的学术追求。“党史学的研究较之其他历史学科的研究,处于落后状态”,不仅“党史过程、事件、人物的研究多属低层次”,而且“对研究史料及其利用方法的史料学、文献学,重视很不够”^③。以后,尽管张静如对于“中介理论”有过几次概括,在内容上有着少许的不同,但关于“吸收传统治史方法”皆是基本的内容,如1996年3月的《关于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及1999年10月撰写的“评文记事”中,皆是把“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列为“中介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④。张静如不仅在建构中共党史学“中介理论”中提出“吸收中国传统治史的理论和方法”主张,而且还在党史研究中身体力行地贯彻这个主张,他特别强调要对相关史料的辨伪、考证,要有文献学、史料学、目录学、校勘学等辅助学科,藉以使“吸收中国传统治史的理论和方法”主张落到实处,提升中共党史学的学术性内涵,推进党史研究水平的提高。

五,借鉴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方法。张静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提出的“中介理论”,固然是立足于党史学科的发展,目的在深化党史研究,提升党史研究成果的学术性内涵及其研究结论的说服力,但同时也是在多学科视域中构建“中介理论”体系的,故而也就特别重视借鉴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早在1987年发表的《党史学科建设断想》文章中,张静如就强调运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深化党史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史研究在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也应该这样。他指出:“党史的研究,应该特别注意吸收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中有用部分,诸如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民俗学、民族学,等等。”^⑤1989年发表的《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在过去提出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基础上,又增加了政治学、法学、

① 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② 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③ 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

④ 张静如:《静如文存》下卷,第898~899页、902~903页。

⑤ 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

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①。这说明,张静如关于党史学理论在吸收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上,所关涉的学科是不断扩大的,包括了绝大部分意识形态较强的社会科学门类。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张静如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高度重视的,但提出党史学研究需要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一开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主要还是集中在“社会科学”方面,很少在理论上涉及人文学科,尽管他认为党史学是历史学,党史研究必须遵循历史学的研究路数。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已经注意将“人文”学科纳入其中。1996年3月,张静如所做的《关于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的报告中,提出的“中介理论”体系中,就有了“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认为党史研究需要汲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②;而在1999年10月对于“中介理论”体系的概括中,“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居于重要地位^③。张静如在注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又特别注重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于党史学理论建构的意义,这是“中介理论”体系在内容上的重要发展。

三、“中介理论”对党史学科的意义

张静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构建的党史学“中介理论”是指导党史研究的学科理论,在中共党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中介理论”对于党史学科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在学科中的指导地位。张静如创建的党史学“中介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是“中介理论”的思想灵魂。毫无疑问,在中国,包括党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及其各领域,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是由中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状况所决定的。但马克思主义在学科中占有指导地位并起主导作用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具体地指导各门学科而成为学科的指导思想,各个学科又如何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具有特色的学科理论体系,这还是需要根据学科的具体性质及学术研究状况而不断地加以探索的。张静如提出党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将马克思主义对于党史研究的指导地位,具体地落实在建构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上。为此,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解读,找出唯物史观中作为哲学概括的“根本原理”部分,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规律的理论,借以为创建党史学“中介理论”提供理论指导。也正是通过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和解读,张静如在唯物史观中找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现代化”“社会进化和变革”“社会意识”“个人和群众”等主要内容,并使之与“党史学”建立理论的、逻辑的联系,撰写出系统表述“中介理论”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著作,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对于学科的指导地位落实在创建学科理论上,因而也就进一步凸显马克思主义对学科的指导意义与指导地位。

第二,有助于建立中共党史学的学科理论。在张静如看来,20世纪80年代的党史研究尽管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党史学科的现状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其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弄清党史学科的学科性质,更没有能够在把握学科性质的基础上建立党史学自身的学科理论,因而也就需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建立党史学的学科理论。他在《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的“导论”中指出,该著是为了“阐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党史

① 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② 张静如:《静如文存》下卷,第899页。

③ 张静如:《静如文存》下卷,第903页。

学的关系”，党史研究不深入的原因“很重要一点是研究中缺乏理论的指导”^①。张静如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发表了《党史学科断想》《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关于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等文章及出版《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专著，在中国的党史学界建立了“中介理论”，填补了党史学理论上空白。自此，中共党史学有了自身的学科理论——“中介理论”，有力地推进了党史学研究的深化和学科的发展。概括而言，张静如创建的党史学“中介理论”，有这样几个显著的特色：一是理论性。张静如的“中介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构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相结合的理论探索，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因而也就成为党史学研究的学术理论。二是学术性。学术性乃是学术理论的本质属性，惟有具有学术性的内涵才能称之为学术理论。张静如创建的“中介理论”有着厚重的史学底蕴，同时又汲取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成果，其学术性特色是非常显著的。三是体系性。张静如的“中介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统率相关的学科理论和学科方法，形成了“中介理论”体系，如1996年3月《关于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学术报告的六条概括及1999年10月的五条概括。正是经过多次概括和提炼，这个“中介理论”体系既有理论的部分又有方法论的内容，可以说是自创体例、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四是应用性。张静如的“中介理论”是从党史研究中概括和提炼出来的，反映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现状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因而“中介理论”中所分析的问题、所提出的对策、所作出的学术结论等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指导党史研究的深化有着实际的应用价值。张静如创建的“中介理论”使中共党史学科有了自身的学科理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史学科发展的重要成果，标志着中国的党史学研究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有利于推进党史学学术性的提升。张静如建构的“中介理论”是党史学理论，对于党史学来说有着突出的学理性、学科性和运用性的特色，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相结合的特点，有助于推进党史学学术性的全面提升：

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主张有助于对党的历史活动的科学把握，在理论逻辑之中推进党的历史活动规律的研究。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视域之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既是解放生产力的活动又是发展生产力的活动，无论是变革旧社会还是建设新社会都在于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党的历史活动的全新认识，有助于深化党的历史活动的特质及历史活动规律的认识，从而提升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内涵。

二是“以社会史为基础”的主张有助于加强党的历史活动与中国社会变革的联系，从而在史学视域之中提升党史研究的学术性内涵。“以社会史为基础”的主张就是中共党史研究必须以近现代中国社会研究为基础，充分地借鉴和汲取中国近现代中国社会史资料及其研究成果，将党的历史活动置于社会生活诸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的诸方面）的复杂关系中而进行社会的各方面分析，找出中国共产党历史活动的复杂社会原因，并具体地描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在社会生活诸领域中的各种反映。这是推进党史研究史学化、学科化的重大努力，使人们认识到党的历史活动乃是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中的活动。

三是“社会现代化”的主张有助于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中理解党史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张静如提出的党史学“中介理论”中引入了“社会现代化”的范畴，并将党的历史活动解读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党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同时又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新理解、新判断、新阐发。这是在唯物史观的“解放和发展生

^① 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第6页。

产力”思想指导下的重大突破,有助于阐明中国共产党历史活动的现代化内涵及发展方面,从而更好地呈现党史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四是关于党史研究汲取“传统治史方法”和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主张,有助于在方法论层面推进党史学理论的完善。张静如提出的党史学“中介理论”,主张汲取中国传统治史方法的精华,同时还主张借鉴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不仅有着方法运用上的开放视域和多元兼容的显著特色,而且在方法论上亦体现出研究方法的有机集成的理念,提升了“中介理论”的针对性和应用性,从而更有助于“中介理论”在指导党史研究中发挥作用。

第四,为党史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张静如的“中介理论”对于党史学理论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启示:一是建构中共党史学理论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且需要在认知和解读中凸显唯物史观体系中“根本原理”的部分,唯此才能使建构的党史学理论具有学术上的传承性和理论上的经典性特色。二是建构中共党史学理论需要深入把握党的历史活动的性质、过程、特质及其规律,并善于对党的历史活动在抽象之中由具体上升到一般,从而在总体上驾驭中共党史学的发展进程。三是建构中共党史学理论需要研究社会发展、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特征,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中、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中与时俱进,才能创造出反映时代主旋律的学科理论体系。四是建构中共党史学理论需要有多学科的研究视域,同时还需要兼容并包的学术胸襟和集思广益、有机整合的学术技能。随着学术界对于党史学“中介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随着中国的党史学的发展和进步,张静如创建的党史学“中介理论”的意义和价值也将不断地呈现出来,并在党史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静如的党史学“中介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不断行进,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体系。“中介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以“社会史为基础”,汲取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与中共党史研究的结合中进行了开创性探索,为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化作出了重大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中共党史学史上而且在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史上也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本文作者 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浙江 311121)

[责任编辑:王 昌]

本 刊 启 事

本刊已入编中国知网及其电子期刊网站,凡在本刊发表的文章都将自动进入该电子出版物,本刊所付稿酬已包含电子出版物及网上服务的报酬,不另计酬,凡有不同意者请特别声明。

本刊编辑部